

全球化和跨国问题研究*

On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Issues

夏明

(Ming XIA)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它给人类生活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通过评述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研究，本章试图讨论下列两个主题：第一，政治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对全球化的研究有哪些争论和取得了哪些进展？第二，全球化如何改变了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中心议题，使得哪些全球性问题凸现出来？通过梳理各流派对全球化和跨国问题的研究，本章试图强调全球治理体系和各国国内治理体系都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以求更好地管理全球化，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It ha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upon both human life and human thinking.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on globalization, this chapt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First, with regard to the studies of globalization, what controversies and contributions can we identif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particula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how 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the research agenda and highlighted certain transnational issues in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issues, this chapter calls for reforms in both global and domestic governance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serve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引言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T·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选择了两个日子来界定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11/09”和“09/11”。前者是 1989 年 11 月 9 日，这一天割断东西欧国家近三十年的柏林墙被推倒，成为冷战结束的象征；后者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这天拉登盖达组织的 19 名恐怖分子劫持四架大型民用客机以自杀性方式进攻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楼，宣告反恐时代的到来。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过去全球化力量涌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冷战的结束又将全球化的力量全面释放了出来，成为尔后十几年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全球化对世界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和冲击都是历史性的：伴随着西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急剧扩张、财富的倍增和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巩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美国的霸权主义也引发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美情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和以全球化为靶子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把世界的注意中心引向了一系列的跨国问题。

本章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围绕全球化与跨国问题的关系来讨论下面几个主题：第一：什么是全球化？在认识到全球化理论研究主要活跃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的前提下，西方全球化理论有哪些进展？第二：面对全球化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各个流派又是如何

* 本文为作者未出版书稿。该书稿是《西方人文社科研究前沿报告与分析丛书·国际关系分卷》的其中一章。征得作者和该丛书编者的同意，我们出版本文于此，以飨读者。——编者

在理论上发展创新并对跨国问题和世界秩序做出新的解读的呢？第三：全球化催生和激活了那些跨国问题并使它们成为全球议事日程紧迫的中心议题？第四：这些理论上的新贡献对各国政府政策又具有什么启发呢？

由于全球化是一个多学科的话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课题的讨论(Baylis and Smith 2005; Kratochwil and Mansfield 2006; Krieger 2006; Kesselman 2007)。但我没有任何意图误导读者忽略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对全球化研究的杰出贡献（参见 Jeffrey Sachs, Jagdish Bhagwati, Amartya Sen, and Joseph Stiglitz 等著名作家写的有关论述；有关全球化社会、文化、社会等影响，同时参见 Held et al 1999; Castells 1996, 1997, 1998)。又因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英语成为了学术界的主要交流工具，本章涉及的文献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特此加以说明。

冷战结束与全球化时代

英国学者贝里斯和史密斯(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2005: 8)在他们颇具影响力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一书中给全球化下了如下定义：“我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各社会之间相关联系不断增加的过程，并由此而导致世界某地的事件对遥远的人群和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所谓全球化，就是在技术（电脑、信息和交通最为重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和社区及其居民的地理空间和时间距离急剧缩短的过程。作为一个过程的同时，全球化也是对某种状态的描述：例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更高程度的相互依存、政治经济文化更深层的一体化发展、人类社会互动的更高频率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明显的互信和猜疑，最后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以全球性现象出现，作为回应，全球性合作和这种合作衍生的全球智慧也随之产生。弗里德曼在《凌志轿车和橄榄树》一书中所用的“全球化革命”(Globalution)和“全球化体系”(Globalization system)就分别表述了全球化的过程和状态。在讨论全球化作为一种状态时，学者们既可能把它作为一种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特征的描述、也可能是对未来状况（或者说是全球化末端）的预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从2003年开始发表各国“全球化指数”。见：www.foreignpolicy.com）。在T·弗里德曼(Friedman 2000:9)看来，“全球化体系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也有学者（参见：斯特格尔 Manfred Steger）提出“全球化”、“全球性”(Globality)和“全球主义”(Globalism)三个概念来表述全球整合的过程、状态和价值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从千年文明交流和世界地域空间来看待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既不新，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全球遗产。例如，千年以来，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就向今天的欧洲输出了各种文明成果(Sen 2002)。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肇始于五百年前，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就是全球化进程。比如，弗里德曼在《凌志轿车和橄榄树》和《世界是平的》二书中就将它划分为“全球化第一阶段”(从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到大约1800年)、“全球化第二阶段”(从1800到2000年)和“全球化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吉尔平(Robert Gilpin 2000:19)认为，二十世纪末的经济上的全球化程度只是回复到了一战前的水平。正因为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是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开山鼻祖(Hobden and Jones in Baylis and Smith 2005: 225)。例如，在科索尔曼(Mark Kesselman 2007)新近编选的《全球化政治读本》(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 A Reader)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录成为第一篇文献。阿根廷经济学家卡茨(Claudio Katz)认为，“《共产党宣言》预测到了现在的全球化进程，以后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论基础。”(Katz 2001: 5-16)。

但一般说来，学术界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重要的世界性现象，或者说全球化历史演绎的质变主要集中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多年里。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就有关列宁、卢森堡、布哈林等人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我在复旦的老师陈其人教授早有独到见解。见：陈其人，《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引发的金融体系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个重要里程碑。正如全球化的进程主要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发生了飞跃性的突变，全球化理论基础也是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打下的。具体说来，今天的全球化理论受到了九大理论的影响：现代化理论（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科尔曼、亨廷顿和阿普特等人）、经济成长论（罗斯托、刘易斯、库茨涅茨和加尔布雷兹等人）、相互依存理论（基欧汉和小奈伊为代表）、地球村理论（麦克卢汉、托夫勒）、世界社会论（伯顿）、世界秩序论（福尔克、门德罗维茨、金和米勒等人）、国际社会论（布尔）、历史终结论（福山）和自由和平理论（康德、拉希特、多伊尔）（Baylis and Smith 2005:9-10）。尽管全球化的研究与现代化理论有思想承袭关系，有学者因此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续，但事实上，全球化不同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基于西方启蒙时代科学、理性、进步等理念上的、它基本上是一个以工业化目标的线型发展；而全球化却充满不确定性，带有更浓的后现代色彩，多种力量的较量可能会产生复杂多元的结果。当然，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试图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话语上的霸权地位来界定全球化，并试图将全球化诠释为实质上的西方化；而美国中心主义者又力图将它推上美国化的轨道。由此而产生的文明的冲突事实上并非“全球化”对“反全球化”（或“非全球化”），而是不同模式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相争以追求统治地位的过程。“全球化”和“本土化”双重变奏也是世界各国、各族群和各阶级捍卫和扩展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不同作为。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解密全球化的动因。尽管大多数学者并没有采纳单因论，而是采纳多因论，出于理论探讨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全球化动因的讨论归纳为“历史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个人选择论”、和“政治权力选择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有从历史的阶段和发展规律去分析全球化动因的：比如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拉美学者倡导的依附理论、沃伦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都是从历史的大规律来看全球化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已成为毫无争议、没有意识形态挑战者的历史归属——也是带有历史决定论的痕迹的。弗里德曼则直言自己是“技术决定论者”（2006：460）并认为世界已被下列十大技术突破“压平”了：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而微软电脑视窗出台、1995年8月9号万维网技术成熟推广、工作流程软件、资讯上载、生产外包、离岸生产、全球供货链、资源内挖、资讯搜索（例如谷歌）和帮助人们有效利用上述技术的所谓的“神力丸”（诸如手机、数码产品等）。同时，T·弗里德曼也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言人，把全球化的实质看成“经济自由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一书中，叶尔金和斯坦尼斯洛（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1998, 2002）从市场动力和经济利润来解读全球化，并把跨国公司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政府屈从于市场”成为全球化的主旋律，这不能不说是新自由主义跟从了经济决定论的逻辑。既然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势必认为全球化的终极原因来自个人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自由市场和个人私有产权正是民主和民权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因此新自由主义又认为全球化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或正如曼德尔宝穆（Michael Mandelbaum）所说，自由市场、民主和和平的理念征服了人们和整个世界，二十一世纪必然成为这三项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终结”。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学者则指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M·弗里德曼和政治人物撒切尔和里根）其实是在推行一项政治工程，以服务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利益。从国际体系来看，全球化是西方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结构性调整”和“附加条件”的政策在第三世界推行的。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政治人物掌管国家后通过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来将全球化引向他们所愿，同时，新自由主义构建的全球主义有可能会遇到社会运动和政治势力的挑战，全球化的进程、方向和内容都会充满不确定性甚至遭遇挫折和失败。建构主义也将“政治权力选择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不过，它试图构建新的条规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引导全球化服务的对象是国际社会的“公共的”（Public goods），而非新自由主义的个人利益。

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通讯交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全球化研究必然是一项多学科的综合工程（参见 Held, et al 1999）。本章关注的中心当然是

政治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政治。这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政治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作为政治演进过程。无论从其动因、演变方式、主要参与者的构成和关系、以及它最终服务的利益，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权力和政治冲突、以及最后的政治决策和利益分配。例如，许多国家（欧盟是个例子）自愿放弃部分主权通过区域整合和一体化来应对政治经济的挑战，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个例子）和国际法的作用和地位也在不断扩展和提升，全球性的决策机制和治理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国际论坛和跨国社会运动都已成为有效的动员、立法和参与的手段、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公民社会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舆论也已形成，许多人已经超越了国籍身份的限制而成为关心全球利益的世界公民（Florini 2000; Held 2004; Karns and Mingst 2004）。这些发展都可以称之为政治全球化。全球化的政治则是指全球化（经济、文化和通讯交通）进程所带来的急剧变迁势必产生新的公共问题并使他们高度政治化，也就是说引发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政治体系势必从制度和政策上去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冲击。例如，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环境恶化（全球暖热、臭氧层破坏、空气海洋污染、沙漠化和水资源稀缺等）、全球化基础设施的形成为全球瘟疫传播、电脑病毒的传播、以及恐怖主义和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协调合作都提供了便利，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人类公共安全和福利的巨大威胁，而且单个国家又很难有效控制和解决。超越主权的事务需要有超越主权的全球性合作和努力去寻找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促生了全球化的政治。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各流派是如何来解读全球化的政治内含（政治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政治）并做出相应的理论调整和政策建议的。

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化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在冷战的环境条件下，国际冲突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决策中始终占据“高政治”的地位，在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现实主义得以长期独占鳌头，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学派。随着苏美关系缓和，石油危机出现，美国面临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挑战，被现实主义冷落为“低政治”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逐渐获得大国更多的关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传统的现实主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它的若干前提和结论在冷战后日显矛盾和破绽，其霸主地位受到怀疑和挑战；现实主义不得不做出重大理论调整；另一方面，国际相互依存的强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为长期受压在现实主义霸权下的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发展空间，聚集在理想主义旗帜下的各流派成为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兴起的最大受益者，在此思想基础上，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得以产生（建构主义是一个明显例子）。

（1）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有下列几个基本判断：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角色；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最高目标；国际体系基本处于一种无序（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持和平的最重要资源；政治事务出现“高、低”之分（国家战略安全、军事事务和政治外交是“高政治”；经济贸易、环境、文化交流等是“低政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零和游戏的竞争状态，矛盾和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内政和外交分属不同的两个领域，民主、道德、公平等价值观念在前者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后者可以打折扣或全然不顾；双边外交、遏制、权力均衡甚至战争成为解决国际冲突和维持和平的主要手段；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基本上服从于和服务于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需要。

全球化的新发展使得传统现实主义上述的诸多判断受到挑战。部分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全球化”其实是“全球废话”（Globaloney）（Keohane and Nye 2001:3），例如，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根本就没有全球化，世界经济对美国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施加什么限制；即使在1990年代也找不到很多全球化的证据，因此，全球化并未改变国际政治的实质（Waltz 1999; Dunn 2001）。一些现实主义者走向了择衷的道路，修正了部分观点，游离向了多元主义（在下面讨论多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还会回到这一主题），而这里我主要讨论现实主义坚持派对全

全球化的诠释和回应。人们通常把沃尔兹 (Kenneth Waltz) 的结构现实主义叫做“新现实主义”，但今天学者们讨论全球化理论时，这一标签又可以运用于现实主义的新近发展，例如，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防御性现实主义”(Baylis and Smith 2005:208-211)。即便秉承同一传统，扬弃选择和侧重强调的差异把新现实主义对全球化的反应引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回应。在美国，共和党右翼政客布坎南鼓吹美国中心、美国至上，美国应收缩它卷入的全球事务，回到“美国堡垒”里来（他还提出在国内重申“文化大熔炉”的传统、强化对新移民的“美国化”施教、建议在墨西哥边境筑起“布坎南墙”将移民阻止在外）(Buchanan 1998, 2002, 2006; Steger 2002:84)。1990 年鼓吹民粹主义的独立总统候选人佩罗(Ross Perot)基本上也有同样的观点。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在用“文明的冲突”来描绘世界秩序时，也提出了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保存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实力。他既反对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政策建议，也反对部分保守人士提出的带有“帝国主义”倾向的政策选择 (Huntington 1996 and 2004:362-366)。沃尔兹 (2000) 认为，全球化是九十年代被炒作出来的时髦，其实全球大多数国家并未卷入全球化。“全球化是美国造的，亦即，现存的支撑和推动国际经济的体制和规则都是在美国掌控之下。”“国际政治”依然是“国际”政治，它最终受到国家能力而非全球化的左右。就美国而言，由于国家开支的急剧增长和国家卷入到更多的新功能中去，国家的权力并未缩小，反而对国内外社会和经济的控制都有所强化，我们依然指望国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将继续是最重要的角色，唯有国家才有足够的权力来控制或管理全球化进程。”在欧洲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思潮和运动(Steger 2002:95-116)。

二是“全球主义-帝国主义”的回应（这里主要是指美国的新现实主义，因为在美国超强治下，没有多少国家还能享有这种现实主义外交的奢侈）。美国超强的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好处，维持和延长这一霸权是新现实主义各流派的共识。例如，亨廷顿(Huntington 1993 in Art and Jervis)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为什么国际超强地位至关重要？”一文，指出美国政府必须要比任何一个政府在更多的事务中对更多的角色的行为产生更多的影响。只有这种国际超强地位才能免除美国求助武力来追求利益的麻烦。但在如何追求和维持霸权的手段上，并非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主张军事冒险和海外干预。比如，米尔斯海默和一大批现实主义者就明确反对布什的入侵伊拉克政策，认为它有损美国绝对和相对的安全。尽管有这种反对，美国布什政府基本上是由全球帝国主义的政策(或者说是“新保守主义”)左右的。新保守主义的根本主张是采纳积极进攻型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推行“民主资本主义”，亦即美国的政府理念、经济哲学和社会道德观。

“新保守主义”的“新”体现在要么这些倡言者是新近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左翼思想阵营转到保守主义，或是保守主义里出现的新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已故纽约联邦参议员莫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已故里根总统、里根内阁驻联合国大使科克帕特里克 (Jeane Kirkpatrick)，副总统切尼、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前副国防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维茨。著名专栏作家珀多雷茨 (Norman Podhoretz) 和其妻德克特 (Midge Decter)，著名专栏作家柯里斯托尔父子 (Irving Kristol 和 William Kristol) 是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已故政治理论家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因培养了大批新保守主义者而被奉为该理论之父。E·柯里斯托尔 (Kristol 1995) 在“新保守主义的信念”一文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第一，“爱国主义是天然健康的感情，应得到公、私机构的双重鼓励”，第二，“世界政府会导致世界暴政，因此是个可怕的想法”，第三，“政治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区分敌友的能力”，最后，“对于一个大国，国家利益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大国的本性是意识形态化的，除了物质利益关怀外，不可避免地有意识形态的利益。排除特殊情况，美国有义务来保护民主国家免受国内外非民主势力的攻击”。支持所有这些政策的是这么一个事实：“面对世界各国任何一种可想象的组合排列，美国都拥有惊人的军事优势。”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布什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即所谓的“布什主义”）出笼了。布什政府不仅认为自己有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来追求扩张性的区域政策，而且有政治意愿来维护美国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如果美国遇到恐怖分子、“流氓国家”的威胁或者挑战美国的利

益和价值,美国可以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很明显,对于全球化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美国试图掌握领导权,推行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

在现实主义流派中有所谓的“霸权稳定论”(代表人物有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和卡根),其描述性的结论是:一个大国(“罗马和平”、“大不列颠帝国盛世”、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世纪”)对于维护世界相对持久的和平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这一理论的政策建议是:维持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不仅是维持世界自由经济秩序和平的基础,它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全球也应该认可,美国的霸权地位(尤其美国作为一个“开明仁慈帝国”)是有益于他们的利益和繁荣的,因为和平是一项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Gilpin 1987:72-92; Keohane 1984: 32-46; Kagan 1998)。与此相关联的另一项理论是“民主和平论”,它的基本判断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开战。”因此,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民主体系在全球的胜利。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肩负有历史的重任去输出和保卫民主,为了美国和西方自身的安全,他们应该在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契约,”从而在“西方对所有国家的对抗”中,尤其是在面临伊斯兰教一儒家文明联盟(亨廷顿称之为“非神圣同盟”)的挑战中,得以自保生存并最终取胜。因此,“霸权稳定论”倾向于将美国化等同于全球化,“民主和平论”更倾向于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

(2) 多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在继续讨论现实主义部分信奉者向自由主义位移时,我们有必要澄清几个概念。在美国政治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它其实包括了我们学术界讨论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流派的主要人物。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所谓的“新-新之争”,就是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后者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支流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其代表人物基欧汉明确表明自己与新现实主义的亲缘关系。因此,所谓的“新-新之争”并未有重大的理论分歧,而只是着重点上的差异。两个学派形成了这样的分工:新现实主义继续在安全研究领域占强势,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兴趣则集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环保和人权问题上,二者都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内解决问题,以维护体制的总体稳定,而并不挑战体制(Baylis and Smith 2005:205-224)。显而易见,如果从方法-问题二者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全球化作为中心议程来研究,并以此获得理论发展的实证材料。

现实主义信奉者向多元主义位移可以从目前非常活跃的几个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例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基本上是坚持国家中心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但同时,他又对现实主义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判,认识到了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民主治理体系、国家建设对世界秩序的重要性。他也鼓励以美国为领袖的、以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对失败国家进行积极干预、并以民主价值观来重建国家。他认为世界分为“后历史部分”和“历史部分”:前者是采纳了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后者是还未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自由主义在前者有效,在后者或者当前者在和后者打交道时,现实主义还应奉为圭臬。由于信奉了民主自由的历史必然性,福山使得自己的政策主张带有乐观的色彩,这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悲观色调(Fukuyama 1992:245-284; Fukuyama 2004; Fukuyama 2006)。再例如,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宣称自己是“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全球事务和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但全球化有阴阳两面(进步的和阴暗的),美国必须运用得当的权力(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才能应对全球化的阴暗面。同时,他认识到国家权力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恐怖主义是对国家权威最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私营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都实力增强,削弱着国家的权威。日趋严重的人口、毒品、货币和武器在全球非法流通显示了国家的弱点。”(Zakaria 1998, 2000 and 2004:16) 这些论述又表明他又以多元的观点来看待国际事务的角色和议事日程。

由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上都被冠以“新自由的”,本文因此选择“多元主义”来标签那些脚踏两个主义的许多折衷或转承人物。这里的“多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是多元角色。国家和非国家角色(例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运动等)成为分析

对象。第二是国家被看作复合体，内部有角色冲突。第三是在国际政治中冲突和合作共存。第四是跨国主义兴起，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发挥着独立作用。第五是国际议事日程的多元化：社会、经济甚至环境等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参见：Viotti and Kauppi 1993）。很显然，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对冷战结束前后的国际事务新发展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因此，在对全球化现象的解读和研究中，多元主义的诸多流派名声鹤起。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多元主义有取代现实主义称雄国际关系理论的趋势。

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基欧汉和小奈伊可以说是关注全球化最早和理论贡献最大的(Keohane and Nye 2001; Keohane 1984; Nye 2005; Keohane and Milner 1996; Kamarch and Nye 1999)。在他们 1977 年出版并在 1989 年和 2001 年不断再版的《权力和相互依存》一书中，他们继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提出在“复杂的相互依存”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利益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具体说来，“复杂的相互依存”有下列几个特征：社会由“多元管道”（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国际的、跨政府的和跨国的）连接起来；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不再是安全事务压倒一切的等级制，而是管理和协调多项议题；军事力量的作用降低，甚至在某些领域失去效用。随着相互依存、一体化和联系纽结的增加，国家相互间“敏感性”和“脆弱性”也随之增加，跨国事务和跨国参与者会出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也越显重要，各种关系网络大量产生，多边主义和跨国主义成为国际合作和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以上的一系列研究给全球化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基欧汉和小奈伊认为从“相互依存”到“全球主义”是一个自然、连续的过程。他们界定“全球主义”为：“通过资本和产品、信息和观念、人员和实力、环境和生物类的物质（诸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通和影响，世界不断卷入相互依存的涵盖跨洲际距离的网络的一种状态。”全球主义是相互依存的一个种类，而“全球化”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则是指“全球主义的增强和减弱”(Keohane and Nye 2001:229)。小奈伊更明确指出，“全球化可界定为世界范围的各种相互依存网络”(Nye 2005:192)。在他们看来，全球主义是多向度的：经济的、军事的、环境的、和社会文化的（也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和科学、娱乐的等等）。他们尤其指出“环境的全球化”是最古老的全球化，例如气候变化、人类迁徙、疾病传播等。他们还指出，全球化也会影响国内政治、国内各阶层和国际间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国与国间的权力关系和全球的治理模式。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对全球化进行管理，而且指出了单边国内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区域一体化、全球范围的多边合作（例如国际治理体系和跨国和跨政府间的合作（包括全球的公民社会）(Keohane and Nye 2001: 259)。总之，就全球化的实质、进程、影响（正反方面）、管理和国际整理模式，基欧汉和小奈伊都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在观察全球化进程上，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先见之明可与上述两位媲美的国际关系学者恐怕只有罗斯诺(James Rosenau)了。早在六十年代末，罗斯诺主编了一本《联接政治》(Linkage Politics)，提出在多元分析层面上来观察政府对政府、组织对组织、集团对集团、人民对人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各种连接，从而理解世界体系对亚体系的相互影响，最终来解释国际关系。他在外交政策研究中关注的“双头”和“多头”联结关系和他们复杂的互动为他以后的“旋流理论”铺了路。1989 年在冷战即将结束之际，罗斯诺完成了他的《世界政治中的漩流：变迁和连续的理论》一书。他断言，随着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互动已经不再牵扯到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已经失去精确性，我们已经进入“后国际政治”的时代(Rosenau 1990: 6)。运用混沌理论，他对世界政治和大气层进行类比，提出世界政治高能量、高速度、和高度复杂性的特征。由于世界的多中心、高度的相互依存、频繁复杂的互动，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世界政治的结构和过程进入了一个没有先前定规和分界的领域。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Rosenau 1990:13)。他认为，全球变迁的动力机制来源于下面五个方面：“技术突破”（尤其是微电子技术）、“跨国问题出现”（大气污染、恐怖主义、毒品贸易、货币危机和艾滋病蔓延）、国家和政府能力弱化、分权化（“亚集团主义”）和人们对上述发展的反馈（Rosenau 1990:12-13）。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诺的“旋流理论”和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非常相识，它揭示了冷战以后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发展，也揭示了后来人们热衷讨论的“全球化”的实质和挑战。罗斯诺从气候海洋得到灵感，不难想见，对促使全球重视大气环境的“蝴蝶效应”的威胁，他的理论也会有所贡献。

T·弗里德曼是将新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全球化观点作通俗阐述的最重要作家。他把自己和克林顿和布莱尔归为一类，称之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一体化倡导者”（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让他们吃蛋糕的一体化倡导者”、“提供社会安全网的分割主义者”和“让他们吃蛋糕的分割主义者”——“吃蛋糕”比喻来自大革命前夕法国皇后的名言，如果穷人没有面包，就让他们吃蛋糕，以此表达对穷人的漠不关心），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民主党人”的全球化政策主张。首先，弗里德曼将“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下的全球化”定位为全球化唯一的模式，全球社会理想的目标就是美国社会的放大。这一全球化进程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其客观存在就像每天的日出一样。各国要发展，就必须套上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黄金甲”（Golden Straitjacket）（Friedman 2000:101-111）。其次，他认为全球化给世界和平和繁荣都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制止冲突的金弓理论”——迄今为止，有麦当劳金弓型“M”出现的国家相互没有交过战（Friedman 2000:248）。后来他又将他的理论调整为“制止冲突的戴尔理论”，亦即，如果两个国家同为一个全球供应链的成员（例如戴尔电脑国际生产组装链），这样的两个国家还未交过战（Friedman 2006:522）。再次，他提出，在由各种网络组成的世界里，主宰全球化的三大主要力量是“超级大国”（美国）、“超级市场”和“超能人物”。美国作为世界的“良主”，其外交必须维持国际主义的精神，对全球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和做出更多的牺牲。如何管理全球化，使之更民主化和可持续性发展，已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全球化当成一个机会，认识到“世界是平的”，他们已获得开放和公平的竞争平台，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全球化的超级市场。对个人来说，无论是得利者还是失意者，全球化都为“超能人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历史，关键在于他们是否会利用新兴的技术和机会。事实证明，许多人权、环保、劳工权利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学会了利用市场来为他们的理念服务。最后，他提出运用好辩证法来协调下列矛盾：“凌志轿车”（高技术）与“橄榄树”（传统和社区）的平衡，物质消费主义和精神充实道德提升的平衡，富人富国与穷人穷国的平衡，经济与政治和企业与政府的平衡，美国和世界的平衡。为此，他提出了“全球一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来寻求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向良性互动。

基欧汉、小赖伊、罗森瑙和弗里德曼的论点和主张有许多相近和互补的地方，他们两个重要相同点是在看待国际环境和对待美国国家利益上。他们都认为国际环境基本是处于一种追求私利的竞争状态，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思考和评价全球化的出发点。这与现实主义学派又很相像。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自由主义其他流派和一些更偏向左翼的学派则超越了美国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迈向了以全球为本、以全人类为关怀的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观。

（3）理想主义与世界主义

国家利益是基于领土和主权概念的。主权国家，或者叫“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 1648 年在欧洲确立的（Miller 1998）。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出现给这一体系带来了严重挑战。其实远在欧洲基督教思想、近在社会主义思潮中都有人类最终走向大同的梦想（或许叫“乌托邦”，“世界政府”，“和平共同体”，“全球社会”，和“人类政体”）（Kim 1984:302-305），理想主义的学派与上述各流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力图用“人类利益”超越“国家利益”，“人类安全”超越“国家安全”来分析整个地球和人类面临的威胁，以及寻找全球解决方案。因此，在理想主义中，“平等”，“公正”，“世界公民权”和“普世主义”成为讨论全球化重要的价值观。

例如，“世界秩序理论”（World Order Approach）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天普大学的米勒教授提出了“奥林匹斯山神的地球观”（Miller 1998: 64）。他写道：“[我]看到的世界基本上像宇宙穿行者在远处回望地球。透过这样的视野，地球地形细微的特征变得模糊不清或无影无踪了。国家间的分界不复存在。总的感受是，地球表面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Miller 1990:79）。世界秩序理论的倡导者试图不再以“领土的或国家的动物来思考、感受和行动，而是以人类种类来行为”（Falk, Kim and Mendlovitz 1991:219-276）。这一理论的价值前提是致力于“造就一个公平和人性的世界秩序，它体现的基本理念是和平、经济公平和福利、社会正义和环境质量。”（Falk, Kim and Mendlovitz 1991:9）。另一位学者提出了“全

球人本主义观，”它的中心问题是：“谁为这个星球代言？”因为全球人本主义关心的是人类利益，这是高于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和官僚利益之上的（Gurtov 1988: 42）。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世界秩序理论的创始人福尔克批评由全球资本和政府互动为动力的全球化是“上压的全球化，”“掠夺性的全球化。”为此，他提出了由全球社会运动和全球公民社会为动力的“下推的全球化，”从全球化失益者的角度来强调下列原则的重要意义：公民的同意、法治、人权、参与、政治责任、公共产品、透明度、和非暴力，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最终实现规范的民主（Falk 1999）。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爱眉（Amy Chua）在其畅销书《起火的世界》中，用“世界民主”针对美国推行的“全球民主”（在美国领导下的民主国家建设）、用“（再）分配正义”针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全球化的重要危机：美国向世界输出的“自由市场民主制滋生了族裔仇视和全球动荡。”她的解释是：全球化造就了一个“支配市场的少数人”（通常与社会中的大多数有种族差异），民主化激活了“控制选票的多数人”；而前者不愿意照顾大多数人的经济福祉，后者不愿意保护少数人的权力自由。为此她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把凯恩斯的福利资本主义精神和麦迪逊的“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原则融入全球化之中（Chua 2004）。但必须指出，蔡爱眉对全球化和其带来的危机的分析存在着许多缺陷，例如她在批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时，没能认识到市场精英试图维护的是“特权市场，”而民粹主义的政治精英追求的是“大民主。”她也没能认识到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都比全球化要久远，而且，今天世界的族裔冲突并不一定比全球化时代之前更为血腥和激烈。显然，在讨论全球危机时，全球化又容易成为人们加以简单化攻击的靶子。

真正对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巴伯（Benjamin Barber）。早在 1992 年，当人们还正热衷于谈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时，巴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吉哈德（圣战）对抗麦克世界”一文。后来他又将文章扩展成书于 1995 年出版。他指出：现代技术、传媒、和经济的发展生就了全球主义的趋势，它命名为“麦克世界”（他从 McDonald's, Microsoft, Macintosh, MTV 得到灵感）。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麦克世界”又造就了自己的孪生兄弟---部落主义（因为全球主义和部落主义在相互刺激对方的发展），它把人们分裂为文化、族裔、宗教和民族的小块，并将它们对立起来。巴伯将这种传统主义的趋势称之为“吉哈德”（在伊斯兰教中为“圣战”之意）。在全球同一个文明下，这两种趋势分别导致“野性资本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野性恐怖主义”（或者叫“圣战原教旨主义”）将地球撕裂。全球化的现存框架滋生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暴力，危害和破坏民主。为了超越“初级的动物形态”而进入到“合作的人类形态，”巴伯提出了从“全球公民社会”到“全球民主政府”的发展路径。他认为，现在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试图摆脱民主国家的监督从而规避社会责任和忽略分配正义。为此，全球公民权利、国际公民社会应该动员起来，使得“全球化更民主化，民主化更全球化，”自下而上，通过现有民主国家的合作逐渐在“邦联制”的框架下建立全球民主制（Barber 2001: 276-29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伯希望在全球公民动员和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强民主制（相对于只有民主形式却没有参与内容的弱民主制而言）”，这和“世界秩序”理论有许多相同之处。

（4）批判性理论流派（全球化理论的激进解读）

如果我们把上述讨论过的各个流派放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很显然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的讨论从右翼逐渐过渡到主流，然后滑向偏左的学派。随着学者们的政治立场逐渐偏向左翼，他们对主流以政府政策为载体而推动的强势全球化观点也愈加表示怀疑，甚至提出猛烈的批评，由此，一些反主流的批评性流派产生了。一般说来，批评性流派是由理想主义借鉴或糅合部分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产生的。例如，斯德格尔（Steger 2002）和沃克（R.B.J. Walker）就是从“世界秩序”理论得到养料和启发，逐渐激进化而成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从而主张为全球化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具世界主义的国际秩序。（Steger 2002:15）由此，我们看到了“国际主义-平权主义”组成的“国际化（和反国际化）阵营。”因为美国是冷战结束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它推行的全球化政策被批判性流派认为是“损人利己，”也就难怪新自由主义版本全球化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美国版图以外：在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可

以听到不同声音，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可以听到激烈批评，在第三世界就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大规模的反抗（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为核心的恐怖主义也是一种反叛）。

建构主义也可以说是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理论思潮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人物从分析理论与实践、行为与解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来挑战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政策制定中的“华盛顿共识”。他们提出了概念构建、理论解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试图对“安全”、“利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概念进行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诠释，来挑战传统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例如，他们提出国际“非安全”（International Insecurity）概念，并把决策者的注意力引向国家与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联结、浪费惊人的军费开支、全球生态危机等。由于建构主义注重差异性，长期以来被打压、钳制、和边缘化的文化、团体、和女性都从批判理论获得了灵感和力量的支持（George 1994:209）。女权主义学说指出了外交决策和决策官僚体系（包括国际组织）存在的性别歧视，并认为妇女在国际事务中的弱势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角色分工”（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2001: 169-172）。女权主义不仅试图改变她们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而且试图把“更具有女性意味”的事务放在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例如，环保（有人说母亲自然关注“大地母亲”）、人权、本土人权利、贫富差异、全球贫困（贫困的女性化）、童工和女工权利保障、人口（尤其是走私妇女给西方的性市场）走私（就这一专题，还可参见：Williams 1999）、和传染疾病（HIV/AIDS、禽流感等）。同时，他们在解决冲突时也会更多考虑合作妥协、社区利益、和使用非政府组织（Pease 2000; Baylis and Smith 2005: 669-687）。萨森（Saskia Sassen）在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书籍和文章中探讨了全球化造就了若干全球性大都会地区（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吸引了外来移民，尤其是因为制造业的女性化、发达国家对佣人保姆的需求增加、和性交易市场的活跃，妇女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是相对发达国家和全球生产链而言，也是相对落后国家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同时，她指出，全球化、移民、人口走私、暴力、性交易、有组织犯罪、洗钱、贫穷、和国家权力都交织在了一起（Sassen 2001, 2002a, 2002b, 2004）。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还遭到了“环保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环保主义者，诸如“绿色和平”等组织，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市场失灵”）和工业化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这一主题，还可参见：Ostrom 1990; Kegley and Wittkopf 1998: 375-498; Hardin 2005）；资本主义摧毁了传统的社区和地方本土文化；环境资源的继续贫乏造成经济贫乏，尤其对穷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1994年加拿大和美国学者启动的“环境、人口、和安全研究计划”（EPS）提出了“环境暴力”（Ecoviolence）的概念。他们发现：环境资源匮乏与暴力冲突，尤其是地方低层次的频繁冲突有直接关系，从而造成安全问题，并威胁邻国的安全。而这样的安全问题又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无法理解，传统的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Homer-Dixon and Blitt 1998）。环保主义者们提出了他们的“绿色行动”口号：“全球思维，本土行为”（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全球性威胁，它需要有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上，生态环境应该与安全、自由、正义一道成为重要价值观。另一方面，生活质量的维持、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和融合、可持续性发展都需要权力下放和地方社区的参与和努力。为此，他们强调“全球-本土”的互动（Helleiner 1996）。有人认为环保主义运动是“反全球化”的，其实他们广泛利用了全球化的草根动员和社会运动，彻底拥抱了全球主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在反叛掌握霸权话语的新自由派主导下的“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很容易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中找到最新论据。例如，一个全球化“精英阶层”的形成，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贫富差距拉大，都证明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有效性（Murphy 2000）。资本渗透全球每个角落，也印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Katz 2001:8）。国际非政府组织“着眼地球南部”（FOCUS-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总部泰国曼谷）的创建人贝洛（Walden Bello）指出，现行的全球化出现了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的危机”，国际主要经济组织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基本上已经不可救药，应该推倒重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追求权力分散的、

有特色的、地方化的经济和社区，也就是说应该“去全球化”。其目的是让市场的效率逻辑服从和服务平安、平等、和社会团结的价值观，把经济置于社会之中，让经济服务地方需求，而不是由市场来支配驱动社会（Bello 2002:107-118）。显然，这些论述又反映了“依附理论”的思想。

上述思想尽管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但他们从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全球化的方向和进程：在国际公民社会草根动员方面，这些思想成为全球抗议运动的理论武器。从著名的1999年“西雅图之战”到2000年达沃斯、华盛顿、墨尔本、布拉格、魁北克的抗议运动，我们都听得到这些非主流的声音。他们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凯恩斯体制来规范和管制全球资本主义，维持社会基本正义，所谓的“全球新政”，已经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Stegger 2002:145-148）。在精英决策层面上，他们已经受到一定的关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的批评和最终与世行分道扬镳就是一个重要例子）（Stiglitz 2002）。主要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已经对原有的全球化战略进行了反思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世界银行前总裁沃尔弗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都明确表示要“让全球化有个善面。”在200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千禧年首脑会议上，189个国家签署了列国终结人类贫穷的“契约”--《千禧年发展目标》（UNDP 2003）。2001年开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也以第三世界的“发展”为主题。批判性理论流派从全球社会运动中获得力量，并已经成为商讨全球议事日程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

跨国问题及跨国问题研究

从上面可以看到，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引发了国际关系各流派相对地位和重要性的变化、各流派内部关注的中心议题的调整。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结束、核恐怖威胁的危机感下降使得人们可以关心长期被忽略的经济、社会 and 环境保护等主题：全球生态环境的挑战和危机、全球性传染病和瘟疫、全球性有组织犯罪（计算机犯罪也在其中）（关于全球有组织犯罪，还可参见：Williams and Savona 1996; Findlay 1999; Ryan and Rush 1997; Reichel 2005）、和恐怖主义成为具有紧迫感的跨国问题。所谓跨国问题（或者又叫“全球问题”、“跨主权问题”）是指“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难题，而国家基本无法控制，任何一国也无力独自解决”（Love 2007:3）。不仅问题的实质是超越国家传统主权的，问题的参与者也是跨越国际边界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使用的手段也必须是全球性的。我们有必要关注“跨国倡导网络”（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因为它们已成为推动跨国事务讨论和寻求解决办法的一支重要力量。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有六百多个这样的网络组织活跃在下列领域：人权、世界秩序、国际法、和平、妇女权利、环保、发展、族裔和谐和世界语等。从1953年起的四十年间，其数目增加了六倍（Keck and Sikkink 1998）。

尽管美国长期由现实主义主导外交并倚重单边主义做法，美国已经认识到跨国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将它上升为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国家安全利益重要议题（Art and Jervis 2005: 525-594; Betts 2005: 537-581）。佐治亚大学著名外交政策专家约翰逊（Loch Johnson）把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概括为“核弹、病毒、毒品和坏蛋”（Bombs, Bugs, Drugs and Thugs），可见，除去核扩散威胁和核恐怖外，病菌（人类传染性疾病和电脑病毒）、毒品泛滥和世界性的有组织犯罪成了美国“新安全”的重要内容（Johnson 2000）。早在1997年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重要报告，《全球趋势：2010年》（Global Trends: 2010），明确指出“人口、人均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粮食、通讯、能源和军事技术”将给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定调。在2000年发表的《全球趋势：2015年》里，美国更加重视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的影响，也开始关注全球治理体系。该报告还明确指出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和网络已成为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2004年底，该委员会再度发布《勾勒全球未来：美国情报委员会2020年项目报告》，重申全球化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必然性，但也注意到全球化可能会出现危机，全球化的发展会更多地受到美国以外国家，尤其是亚洲（中国、印度为领导）的影响。未来世界演进方向有下面四个可能：“达沃斯的世界”（更加非西方色彩的全球化秩

序)、“泛美国主义”(美国强势下的包容性更强的国际新秩序)、“新哈里发统治”(建立在狂热宗教基础上反对西方理念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和“恐惧的轮回圈”(恐惧的膨胀导致国家对自由的限制而出现奥维尔笔下的技术极权统治)。(以上所有报告均可在该委员会网址下载,见参考书目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条目)。

联合国在关注全球性事务上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联合国协会每年发布《全球议事日程:联合国大会讨论的事务》(A Global Agenda: Issues b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年度出版物,到2006年停止,共出20多本。联合国倡导的“新安全”、“人类安全”的概念把大量的社会、文化、人权、环境、贫穷等事务都纳入了全球关注的视野。美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库威尔逊中心在一项“冲突避免研究项目”中指出,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面临着下列“非传统因素的威胁”:经济和社会的差异、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的危机、人口危机(西方社会的老龄化和第三世界的人口激增)、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健康危机(Koppell and Sharma 2003)。自从2001年以来,哈夫和隆巴蒂(James E. Harf and Mark Owen Lombardi)主编了《选择立场:全球有争议问题观点交锋》,六年已出四集(2001, 2004, 2005, 2007),就“全球人口”、“全球资源和环境”、“全球人口流动”、“信息和观念传播”、“国际安全新困境”五大专题收集了上百篇争锋相对的辩论文章。他们涉及的全球性问题有:人口老化和增长、环境恶化、石油枯竭、耕地减少和粮食危机、全球变暖、用水危机、移民、难民、脑力外流、生化恐怖主义、核扩散和核恐怖、文化和族群冲突、种族屠杀、毒品和反毒品战、全球资讯业、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电脑普及的后果等。自1999年起,卡斯曼诺-洛夫(Maryann K. Cusimano, 婚后从夫改姓 Cusimano Love)主编了《超越主权:全球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连续修订再版三次(1999, 2002, 2007),就跨国公司、网络化的恐怖组织、全球犯罪、全球毒品贸易、传染疾病、移民和难民、电脑网络犯罪和恐怖威胁、武器贩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全球化和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限于篇幅限制,本章仅就重要的几个全球问题举例说明它们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具体问题除参见本章所引作者和书目外,还可参阅李少军主编的《当代全球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人口。简单说来,相对于稀缺的资源,世界人口太多;相对于经济生产,世界人口过剩。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外,由于受到宗教的强大干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强烈反对生育控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东和南亚)都正经历着人口爆炸。基础教育体系的缺失或低质量无法帮助年轻的一代进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许多中东国家的清真寺成为教育的提供者;一大批没有希望的年轻人被排除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分工以外,他们日渐绝望,却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高能量参与者。由于人们生育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机会成本的影响,在人力资源质量越是高和发展机会越是多的地方(和国家),生育率越是走低;反之亦然。由此出现的第一后果是人口的总体素质下降,第二后果是人口流动(从农村到城市、从穷国到富国)的流量和速度急剧加快,第三后果是享有公民权的西方白人和被剥夺或限制公民权的有色人种新移民、享有特权的大都会居民和被剥夺或限制生存权的城市流民构成了现代社会新的等级体系。所有这些都成为新的国际、地域间、族裔间和阶级冲突的根源。(2)生态环境恶化。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新近推出的纪录片《逆耳忠言》(Inconvenient Truth)深入浅出地向人们讲述了全球升温的科学和历史事实,以及伴随而来的变化无常的天气、干旱、北冰洋南极洲融化和冰川消失、海水升温和洋流减速和变向、沿海都市淹没等危险。在2007年五月,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向世界发出气候变化的危急警报。例如,自1850年有地面温度记录以来历史上最热的十二年,有十一年是发生在过去的十二年中(1995-2006)。全球引发温室效应的废气排放量在1970-2004年间增加了70%,其中二氧化碳增加了80%。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喜马拉雅山冰川的融化将触发更多的山洪、塌方、而后带来河流流量的递减,影响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用水。(参见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http://www.ipcc.ch>)。又有专家预言,到2025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会面临水匮乏的威胁。总之,我们居住的地球是非常脆弱的。(3)全球化的有组织犯罪。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二十年来转型社会遭

遇的重要制度嬗变是“政治与犯罪的纽带”或“国家-黑手党共生体”的出现，人们称之为“哥伦比亚化，”“西西里化，”“俄罗斯化，”或“索马里化。”其实在“化”之前我们可以换上下列任何一个国家：刚果，阿尔巴尼亚，尼日利亚，阿富汗，伊拉克，海第，或墨西哥。与此同时，有组织犯罪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一些犯罪集团组成了跨国联盟。专家估计，人口走私每年的利润不下 95 亿美元，全球洗钱总量在五千亿到一万亿亿美元之间，毒品的年经营额在四千亿美元以上 (Love 2007:141-162)。据《勾勒全球未来：美国情报委员会 2020 年项目报告》估计，有组织犯罪集团（尤其是毒品集团）会成为部分地区实际的统治者，如果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部分国家继续丧失控制力，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可能会走私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对国际安全形成重大威胁。(4)全球瘟疫。人类历史上经历过黑死病（夺走了中世纪欧洲 30% 人口的性命）和 1918 年流感（全球两千五百万到五千万人口死亡）；过去一百年里，流感、伤寒和霍乱成为人类的主要杀手。全球化使得病毒、细菌、寄生虫和恶性病原体以极快的数度跨越国境。艾滋病已成全球性威胁，现在至少有四千万人携带 HIV 病毒。过去几年爆发的萨斯 (SARS) 和禽流感再次向人类发出全球性瘟疫的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5 年发出警告，如果禽流感在人类中爆发 (H5N1 病毒已经使至少一亿五千万的禽鸟死亡)，两到三亿的人口会成为牺牲者 (Harf and Lombardi 2007:186)。

哈夫和隆巴蒂、卡斯曼诺-洛夫在他们的书中都指出了上述问题属于全球化的副产品，或者叫全球化的阴暗面。全球化要么给这些问题提供了传播的基础设施，要么使得这些冲突尖锐激化。它们的危害性还在于，所有的问题都是相关联的 (Nexus)，以致形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辩题似的恶性循环”。例如，贫穷、文盲、人口失控、高失业率、环境恶化（耕地减少、水土流失、沙漠化等）、人口流动和移民、疾病、族群冲突、政府公共设施面临巨大压力、政府失灵和腐败、脑力外流、绝望和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都形成了一个互动的交叉感染的关系（还可参见：Strange 1996; Naim 2003）。尤其是国际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贩毒、贩卖军火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洗钱）的共生关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化都形成了严重威胁 (Mares 2006:2; Williams 2007:200)。因为问题成堆，所以政府无力解决；因为政府失败，所以问题成堆，造就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全球化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美国和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盟）都把“失败国家”（或者叫“崩溃的国家，”“流氓国家”）看作滋生恐怖主义的渊藪，把“国家建设”和“政权建设”作为根本解决全球问题的基础工程 (Rotberg 2003; Fukuyama 2006)。同时，卡斯曼诺-洛夫还指出，面对如此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各国政府、国际合作和跨政府的协调却反应迟钝，造成“制度滞后” (Institutional gaps) (Cusimano Love 2007:306)。用赫尔德的话来说，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的正式权威与正在形成的全球体系之间的三个脱节：国家正式权威与经济体系、与国际组织的政策自主权、与国际法的发展之间 (Saward 1995:535)。为此，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成为应对全球化和全球事务的必然步骤。

全球治理体系

索洛斯 (George Soros) 称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因为它宣称市场是一个自发产生并可维持自身平衡的“奇迹，”它不需要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制度支持和条规治理(波兰尼的《大转变》一书详细证伪了这一神话,它的思想影响了今天的治理体系讨论。见 Polanyi 195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形成就是要尽量摆脱主权国家的束缚。今天，全球的前 100 强经济实力，有一半以上是跨国公司。可见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监督和控制愈来愈困难。今天，世界上三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包括财产和资产)超过了世界上所有最不发达国家拥有的(六亿人口)总和，可见全球社会存在的不公平已经到了难以接受的程度 (Steger 2002:68, 108)。人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六年的世界性的反“新自由主义”版本全球化运动有效地抵制了“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这是哈耶克和 M·弗里德曼的信徒所始料不及的。全球化、一连串的货币危机（尤其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9.11”恐怖袭击使人们认识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需要全球治理体系 (Karns and Mingst 2004: 21-26)。

上面已经讨论到,从价值取向来看,不同的国家和文明会偏爱不同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伊斯兰文明主导的全球社会、多元治理体系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社会还不可能在可见的将来建立世界政府,而是会走向“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见:Rosenau and Czempiel 1992)。美国现实主义的政治学学者兼政治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全球化成了全球霸权的自然主张。”在他看来,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选择只有两个:“全球主宰或全球领导”(Brzezinski 2004:142)。英国学者赫尔德(David Held)则提出了政治全球化带来的多元观的“多中心的治理体系”(国内和全球的治理体系都是这样)。他指出,“今天的全球治理是多层级的、多向度的、和多参与者的体系。”权力的多中心化是指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分享权力;多层次是指超国家、跨国、国家和次国家的机构必须协调运用权力;多向度是指权力行使模式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事情之间都会有差异;多参与者是指不同的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都进入了决策网络(Held 2004)。有学者称之为“多层蛋糕”(中国俗名应叫“千层饼”)和“蜘蛛网”结构(Saward 1995:537)。有学者称之为“新中世纪主义”,意味多种实体和领土单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权威机构、政治效忠和认同共存(Baylis and Smith 2005: 71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盟正体现了这种治理模式(Carmichael 2006)。

美国学者卡尔恩斯和明斯特(Margaret Karns and Karen Mingst)指出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是由下列模块组成的:(1)国际准则和国际法:3000多个多边协议,习惯法和国际私法裁决。(2)国际规范或者叫“软法律”:人权、劳工权利的规范,气候变迁和生态多样性的框架协定。(3)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构:全球性、地区性和其它国际政府组织、国际法庭、全球性会议、“八国”会议、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发展援助和人权监督的非政府组织、临时会议(如禁止使用地雷条约)。(4)国际体制(或译“规制”):某一议题内(如贸易、和不扩散、粮食援助、运输、信息通讯等)相关的原则、精神、规范、决策机构和程序等(Karns and Mingst 2004:5)。而在这众多的模块中,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或者叫“联合国大家庭”)占据着中心位置(White 2002)。很显然,尽管国际法、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整个国际治理体系还不尽完美,人类已经在探索和建立管理人类共同体重要事务的理念和制度。全球性的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并非人类必然的归属(Kaplan 2000)。当然在全球化过程中,要建立一个民主、公正、包容、多元、有效和具有合法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还需要人类长期的共同努力。几个主要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更应从人类的长远和总体利益出发,多尽义务多做贡献。对全球事务的关心和贡献不仅是大国的责任,也是一个民族文明和成熟的标志。

结语

全球化是以技术变革为动力、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大变动。对全球化的概括和描述又是在理论上界定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它也是构建新的权力秩序并服务具体利益的过程。全球化对社会现实和理论抽象产生着双重影响。各国政治力量和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很显然,伴随冷战而繁荣的现实主义主宰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面已很难维持。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理论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它们在全球化研究中,强调和关注了一系列新问题,重塑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议事日程,尤其它们与全球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运动相结合,把全球化变成了一个政治过程,引起了各国和全球社会对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讨论:在资源稀缺的制约下,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权力和利益。由于有各种社会力量和各国的参与,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派的全球化理念和政策都受到了挑战;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网络化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育它的雏型。如果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继续深化、全球公民社会不断成熟、世界的主要大国能真诚关注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体系就会不断完善,从而保障全球化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健康力量。

面对全球化和不断出现的日趋复杂的全球问题的挑战,人类面临着一个“新安全二元困境”(The New Security Dilemma)。它是由全球化加上弱国家和跨主权事务形成的:当我们在采取措施应对全球挑战和弱国家的坍塌危险时,又如何能避免不使弱国家更弱、跨主权

问题更加严重复杂 (Cusimano Love 2007:34)。为此, 各国政府必须调整自己的治理体系和政策, 把全球思维和全球眼光引入决策过程, 在政府体系内建立全球化的协调和引导机制, 平衡全球与国家利益, 学会管理多元的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 与全球治理体系形成良性互动。执政者和公民都须认识到全球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 我们(人与人、人与自然)必须相互关爱, 共同生存。而这个星球因长期被掠夺性的使用已变得极端脆弱, 无数的跨国问题如果一旦爆发成大规模危机, 这种脆弱性就会对人类产生致命的威胁。地球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 而我们的命运和未来子孙的命运又将托付给她。

夏明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他的电子邮件是 xia@mail.csi.cuny.edu。

Ming XIA is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He can be reached by email at: xia@mail.csi.cuny.edu

参考书目

- Art, Robert J.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5).
- Baylis, John and Steve Smith, ed.,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ello, Walden,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2002).
- Betts, Richard K.,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Arguments on Cause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 Buchanan, Patrick, *The Great Betrayal: How American Sovereignty and Social Justice Are Being Sacrificed to the Gods of the Global Economy*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98)
- , *The Death of the West: How Dying Populations and Immigrant Invasions Imperil Our Countr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02)
- , *State of Emergency: The Third World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 Carmichael, Paul, "Briefing Paper: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Krieger 2006: 103-110.
-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 , *The Power of Identi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2]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 ,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3]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 Chua, Amy,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 Cusimano, Maryann K., *Beyond Sovereignty: 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0).
- 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 Dunn, Robert M., "Has the U.S. Economy Really Been Globaliz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4:1,

- Winter 2001: 53-64.
- Ehrman, Joh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alk, Richard,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9).
- Falk, Richard, Samuel Kim, and Saul Mendlovitz,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 Just World Order*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 Findlay, Mark, *The Globalization of Crime: Understand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lorini, Ann M., *The Third Force: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 Friedman, 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0).
- ,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2006).
- Fukuyama, Francis,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Gilpin, Rober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urtov, Mel, *Global Politics in the Human Interes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88).
-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Art and Jervis 2005: 525-538.
- Harf, James E. and Mark Owen Lombardi, ed. *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on Global Issues*, 1st, 2nd, 3rd, and 4th Editions (Dubuque, IA: McGraw-Hill, 2001, 2004, 2005 and 2007)
- Held, David,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92004), in Krieger 2006:94-102.
- Held, Davi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3).
- Helleiner, Eric,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Greens", *New Political Economy* 1:1(March 1996): 59-78.
- Homer-Dixon, Thomas, and Jessica Blitt, eds., *Ecoviolence: Links among E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ecurity* (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 ,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 John, Loch, *Bombs, Bugs, Drugs and Thugs: Intelligence and America's Quest for Secu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agan, Robert,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8).
- Kaplan, Robert D.,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Vintage, 2000)
- Karns, Margaret P., and Karen A. Ming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Politics and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 Katz, Claudio, "The Manifesto and Globalizatio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Issue 121, Vol. 28, No. 6 (November 2001): 5-16.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Kegley, Charles W. and Eugene R.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Boston, MA: McGraw Hill, 1998).
- Kesselman, Mark, *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 A Reade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7).

- Kim, Samuel S. *The Quest for a Just World Order* (Boulder, CO: Westview, 1984).
- Koppell, Carla, and Anita Sharma, *Preventing the Next Wave of Conflict: Understanding Non-Traditional Threats to Global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3).
- Krieger, Joel,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 A Reader*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6).
- Kristol, Irving,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Weekly Standard*, Vol. 8, Issue 47, August 25, 2003.
- , *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Love, Maryann Cusimano. *Beyond Sovereignty: 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2).
- , *Beyond Sovereignty: 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 3rd Edition* (Belmont, CA: Thomas Higher Education, 2007).
- Mandelbaum, Michael,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 Mares, David R., *Drug Wars and Coffeeshous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ational Drug Trade*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6).
- Miller, Lynn H., *Global Order: 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nd, 4th Edi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0, 1998).
- Murphy, Craig, "Global Governance: Poorly Done and Poor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 Affairs* 75:4:789-803.
- Naim, Moises, "The Five Wars of Globalization" (2003) in Art and Jervis 2005:571-579.
-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10", November 1997 (http://www.dni.gov/nic/special_globaltrends2010.html).
- , "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 December 2000 (http://www.dni.gov/nic/NIC_globaltrend2015.html).
- ,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December 2004 (http://www.dni.gov/nic/NIC_globaltrend2020.html).
-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ease, Kelly-Kate 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on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0).
-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57 [1944]).
- Reichel, Philip, ed.,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Jus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
-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senau, James N.,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Rotberg, Robert I., *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WPF, 2003).
- Ryan, Patrick J. and George E. Rush, *Understanding Organized Crime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Sassen, Saskia,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nd ed. [1991]).
- , "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 (2002) in 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eds., *Global Wome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 , "Immigration in a Global Era" (2004) in Kesselman: 2007:450-461.

- Saward, Michael, "Globaliza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5), pp. 532-537.
- Sen, Amartya, "How to Judge Globalism" (2002), in Kesselman 2007:28-36.
- Steger, Manfred B., *Globalism: The New Market Ideolog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alker, R. B. J., *One World, Many Worlds: Struggle for a Just World Pea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88).
- Waltz, Kenneth,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1999, in Art and Jervis 2005, pp. 352-363.
- , "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46-56.
- White, Nigel D.,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oward International Justi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2).
- Williams, Phil, ed.,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Commercial Sex: The New Slave Trade* (London, UK: Frank Cass, 1999).
- , "Strategy for a New World: Combating 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illiams, Phil, and Ernesto U. Savona, ed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London, UK: Frank Cass, 1996).
-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2002)
-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Globalization Grows Up and gets Political,"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00.
- ,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